



浙江师范大学语言学书系

现代汉语形容词 与形名粘合结构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U XINGMING NIANHE JIEGOU

陈青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师范大学语言学书系

现代汉语形容词 与形名粘合结构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U XINGMING NIANHE JIEGOU

陈青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形容词与形名粘合结构 / 陈青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161 - 0925 - 0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现代汉语—形容词—结构短语—研究
IV. ①H14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35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5.75
插 页 2
字 数 637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在作者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的基础上大范围修改和扩展而成，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小句中形名粘合结构的组配规律及其语义分析”（批准号：06CYY014）的结项成果。

本书的出版得到浙江师范大学博士点建设项目、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浙江师范大学“汉语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资助。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汉语形容词与形名粘合结构	(17)
第一节 人类语言的形容词词类	(17)
第二节 汉语的形容词词类与形名粘合结构的意义	(42)
第三节 汉语形容词的内部构成	(88)
第四节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	(120)
第五节 组合式和粘合式形名结构	(137)
第六节 形名粘合结构的性质	(154)
第二章 形容词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能力及其规律	(181)
第一节 作定语的形容词情况的一个统计	(181)
第二节 不能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形容词分析	(189)
第三节 能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形容词分析	(196)
第四节 影响形名粘合结构构成的一些因素	(205)
第三章 形名粘合结构的称谓性和语义分析	(230)
第一节 经济性的粘合和功能性的粘合	(230)
第二节 形名粘合结构的典型特征——称谓性	(233)
第三节 定语的语义功能：直接分类和间接分类	(237)
第四节 定语语义功能的典型性差异	(243)

第四章 个案研究一：“大/小+NP”	(246)
第一节 “大、小”的词汇地位与研究定位	(246)
第二节 空间度量与度量隐喻	(251)
第三节 粘合定语“大、小”的语义分析	(256)
第四节 “大、小”和名词的组配	(284)
第五节 粘合定语“大、小”的语义语用功能	(341)
第五章 个案研究二：“前、原+指人名词”	(382)
引言	(382)
第一节 格式相关成分的语义	(383)
第二节 格式的句法表现	(387)
第三节 格式的变化对比性与指人名词的选择	(392)
第四节 “前”和“原”与指人名词组配的差异	(400)
第五节 余论	(406)
第六章 个案研究三：“数+大+NP”结构	(408)
第一节 程式化的结构	(408)
第二节 “大”的性质和它对结构其他成分选择的影响	(415)
第三节 结构的突显特性及其两大分野	(428)
第四节 结构的语用价值	(442)
第五节 “数+大+NP”的指称与仿造	(446)
第七章 个案研究四：“序数+形容词”结构	(451)
第一节 “序数+形容词”的排序特性及其构成要素	(452)
第二节 “序数+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及其类型	(458)
第三节 排序对象域及其排序侧面	(465)
第四节 排序属性与排序方向——形容词的双重功能	(473)
第五节 属性量度与格式成分的组配选择	(479)
第六节 发展中的非时空排序专用标记“大”	(487)
第七节 相关格式的比较	(493)
第八节 英语中的“序数+形容词最高级(+名词)”	(501)
第九节 结语	(512)

参考文献.....	(515)
附录 英文文献作者汉译对照.....	(560)
后记.....	(563)

前言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形容词和“形名粘合结构”。

“形”指形容词，包括一般所说的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非谓形容词（区别词）等，如“大、小、皑皑、广阔、国营、中级”等。“副词+形容词”在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中被视为状态形容词的一种，本书把它视为词组，因为“副词+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具有理论意义。

“名”指名词，包括一般名词、集体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等，以及指称化的谓词，有时还包括部分名词短语，如“桌子、班级、水、思想、战斗、石窟艺术宝库”等。每一种类型的名词都可以受形容词的修饰，但受形容词修饰的能力有相当的差别。

“形名粘合结构”指形容词和名词不用“的”所构成的名词性短语，如“小桌子”、“火热场面”、“温柔路线”等。朱德熙（1956）提出把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形式分为“甲₁式”、“甲₂式”和“乙式”三种，其中“甲₁式”指性质形容词不带“的”和名词构成名词性短语。后来朱德熙（1982：148—149）又把名词性偏正结构分为“组合式”和“粘合式”两种，其中形容词和名词的粘合式组配大致等同于前述“甲₁式”。朱先生的“粘合式”定义中除了形名组配不用“的”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粘合式中形容词只限于性质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区别词）。我们这里采用比较宽松的定义，只要是形容词和名词组配构成名词性短语，就属于本书所讨论的“形名粘合结构”，不管该形容词是何种类型。因为形容词和名词采用粘合式组配虽然和形容词的类别有关，但并不必然。本研究主要考察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的组配情况，在必要时考虑多个形容词或复杂形容词与名词的组配，如“大长

耳朵”、“精瘦小老头”、“小小村官”、“特大好消息”之类。一般只考虑粘合式形名结构，在比较时也涉及部分组合式形名结构。为了对比或解释同类现象，本研究有时也涉及部分“名词+名词”、“动词+名词”结构。

构词法和造句法其实没有明晰的界限，特别是在汉语这样的“语素清晰、词不清晰”的语言中。沈家煊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60周年学术讲座（2010年）上曾说：“一个世纪以来，从《马氏文通》开始，在探求自己的汉语的特点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成果，如朱德熙、陆志伟等，如陆志伟说‘汉语的构词法与其说是形态，不如说是造句法’，现在的新的国外理论中，如生成语法学派中乔姆斯基的合作者提出取消形态，和句法合并，词的形态就是句法。”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看，汉语的合成词和短语之间的界限都是很模糊的。而且，形名粘合结构本来就被国内学者认为具有相当的“凝固性”，部分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更是认为形名粘合结构就是“复合词”，因为它们不能扩展。考虑到这种情况，本书所说的“形名粘合结构”，可能还应包括一些“形+名”的词，有时对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不作明确的区分。在论述组配原则和语义关系的时候，有可能也使用“形+名”词语作为对比材料或佐证材料。

本书讨论的“形名粘合结构”原则上只限于现代汉语普通话，除了用作比较、佐证外，一般不涉及古汉语和方言的情况。对古汉语和汉语方言中形容词和名词组配的研究很少，我们在进行本研究的过程中收集了部分文献资料和语料，将另作专门研究。

本书的研究目标主要有四：

- a.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词类地位和特点。
- b. 跨语言视野下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的性质和功能。
- c. 基于真实语料的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组配规律。
- d. 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的语义表达。

二 语料问题

如果不考虑单个组配和单个组配之间的频率和可接受性的差异，也不考虑组配的各种句法、语义和语篇以及认知上的动因差异，只单纯考虑组配的实际情况，那么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和名词在理论上的可能组配的集合是一个笛卡尔积（Cartesian product，符号化为： $A \times B = \{(a, b) \mid a \in A \text{ 且 } b \in B\}$ ），该集合由所有有序对（a，b）组成，其中 $a \in$ 形容词， $b \in$ 名词。例如，设形容词集合 $A = \{\text{大，红，优良}\}$ ，名词集合 $B = \{\text{人，苹果，传}$

统}, 则 $A \times B = \{ (大, 人), (大, 苹果), (大, 传统), (红, 人), (红, 苹果), (红, 传统), (优良, 人), (优良, 苹果), (优良, 传统) \}$, 共 9 种理论上的可能组配。如果按照这种算法, 假设有 2000 个形容词, 5000 个名词, 其构成形名结构的笛卡尔积是 1000 万个, 如果再考虑专有名词、名词短语、多个形容词修饰名词性成分, 那么组合的可能性就是一个让人头痛的巨大数字。要弄清现代汉语中的形容词和名词组配的实际规律, 就必须对这些可能组合一一进行甄别归类, 先后运用求异法和求同法, 找出制约组配的规律。如果只考虑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的二元组合, 那么我们也必须在这个理论上动辄以千万计的可能组配中至少辨析出如下一些情况:

a. 某些形容词和某些名词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组合。如“红、传统”。

b. 某些形容词有时可以和某些名词组合, 但只能以组合式的方式组合。如“优良、人”。

c. 某些形容词可以和某些名词组合, 但只能以粘合式的方式组合。如“红、人”。

d. 某些形容词可以和某些名词组合, 既能以粘合式也能以组合式组合。如“优良、传统”。

e. 某些形容词和某些名词一般情况下不能组合, 但是借助某些特殊句法格式或者语境, 可以组合。如“(这是汉民族的一)大传统”。

.....

研究现代汉语的形名粘合结构, 可能有的人认为只要考察上述 c、d、e 三类的具体组合就足够了, 甚至连 d 类中的组合式也不要考虑。这实际上就只考虑了两个类别: 能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和不能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够的, 因为形名粘合结构的构成属于一个系统性的构造, 肯定性组配和条件(能构成形名粘合的类型和条件)、否定性组配和条件(不能构成形名粘合结构的类型和条件)、相关性组配和条件(构成和形名粘合结构最相关的形名组合结构的类型和条件)在系统考察中都是必要的, 我们不但要考察形名粘合组配“有哪些”, 具有哪些特点; 也要考察形名粘合组配“没有哪些”, 不具有哪些特点; 还需要考察形名粘合组配“和哪些组配最相近”, 相互关系怎么样。因此, 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反复检验, 尽可能把辨析出来的各种组合类别进行归纳概括, 最终全面、系统地发掘形名粘合组配的规律。

这种非常合乎理性的方法看似非常科学, 但语言毕竟不是数学和逻辑, 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在上述的分类方法中, 还是有多种情况是很难处

理的：

a. 词和短语的界限很难区别，如“红人”、“大人”都可以看做一个词，也可都看做短语（做词看时和做短语看时意思有差别，其中“红人”做短语看的情况需要特殊的语境）。

b. 一个词可能有多个义项，不同义项的组配能力和表现是不一样的，其语境依赖性也有差别。如“老”在“年岁大”的意义上组合式和粘合式都可以，如“老画家”、“老的画家”；但在“关系持续时间长”这个意义上一般只适应粘合式，如“老同学、老朋友”不能说成“老的同学、老的朋友”。

c. 一个组合可能有多种功能，不同功能状态制约组配的能力和类型，如所谓的离心结构“高速度、长距离”等的类推性。

d. 个人的语感和对具体的组配语境的构想可能有很大差别，如“温柔女人”这样的组配在一些人那里可能就不成立。

e. 最关键的一点，不同的形容词和不同的名词的组配实例的频率、可接受性、标记性程度等都是有差异的，一刀切是否忽视了应有的差别？

.....

虽然有上述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用相对简单的“能”或“否”来进行判断归类至少在现阶段还是可以得出一些规律的。因此，本研究对某些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能力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存在简单化的倾向，这个不足我们会在其他相关论述中尽量弥补。

为了避免单一方法导致的明显失误，我们对于具体的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能力的断定，多依靠作为语言研究者的直觉判断和检索、收集实际语料验证相结合的手段。

用基于语言直觉的内省方法判断组配的可能，在典型的、常用的组配情况中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分析一些边沿情况就比较麻烦，往往会出现诸如“于右任的胡子”式的问题：

有一次，有个小孩摸着于右任的长胡子，好奇的问道：“于爷爷，请问您晚上睡觉时，这把长胡子是放在棉被里还是棉被外呢？”当时于右任答不出来。晚上他上床睡觉，不管把胡子放在棉被里还是棉被外，都觉得很不自在，整晚为这个问题辗转难眠。（魏悌香《点灯的心、点灯智慧：小故事中的大智慧与简单人生真理》，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153）

大多数人对于语言的认识，一般都是习焉不察的。吕叔湘先生（[1980]

2006: 5) 也说:“语言, 也就是说话, 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 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 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很多的语言研究, 也会遇到于右任的胡子的情况, 我们想对语言探个究竟, 想把我们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实际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熟悉的语言的本来状况都产生怀疑, 各种理论、各种状况、各种变化、各种解释……让我们对自己关于语言的某些规律的价值或者断定感到怀疑, 直至对语言研究本身都感到精神颓废甚至信心崩溃。到了形名粘合结构这个专题, 我们可能要问别人, 也可能要问自己: 某个/某些形容词能不能够和某个/某些名词组合? 形容词是以粘合式还是以组合式和名词组合? 粘合式和组合式的形名结构究竟有哪些区别? ……被问的人或者我们自己, 都会对某些回答犹豫不决、自我辩驳甚至走向直觉的反面。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使用中, 可能就像于右任的胡子, 根本就不在意, 但是如果真要研究个一清二楚, 反复地思考、比较、斟酌, 最终可能会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自省的语言材料往往会出处于右任的胡子式的结果, 这可能是干扰我们语言研究的一大障碍。萧国政(2001: 11)的一段话道出了这种困惑:“有一定语法研究经验的人, 很多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有些说法, 开始觉得不能说, 可研究着研究着, 慢慢觉得能说了。你说是刻意制造, 确实说不过去, 说不是刻意制造吧, 它看起来又不常见, 或者简直就不这么说。”他的解释有二: 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语言研究者对异样构造的排斥程度可能会降低, 他说“研究者开始造句时用的是和大家相同的语言编码和语言鉴别的原始语法系统, 可是在研究的过程中, 由于同一现象的流水的慢慢冲洗, 语言的排斥性警觉疲软了、妥协了, 最后就让一些不大能接受的句子进入了合法的通道而被接受了。”这样的原因导致的内省语料可能是错误的。二是研究者补充语句成立的语境的能力比一般人强。他说:“一些句子成立的语境相对比较宽, 而另一些句子的成立对语境的要求比较严, 而成立要求比较严的远语境句, 其语境的铺垫, 是语言接收者瞬间所难以一下补充出来的, 而长时间进行这种现象的研究, 却能提高对特定远语境句的语境补充水平和补充速度, 因而能使这种起始断错的所谓不合格句, 此时能够……领到合法证书。”这种原因导致的内省语料是可接受的, 但会有异样感。语言研究者通过内省收集的语料往往随思考和研究深入, 其可靠性都会有所降低。如果还涉及迁就理论, 那么问题会更多, 这可能也是国内部分学者对形式主义学派的某些论文的一些奇怪的基于自省

的语言例子感到疑惑和不满的原因。

自省的材料可能不可靠,那么统计和收集的材料就可靠?收集到的书面语料、口头语料也会因说话人个体差异、语境差异甚至语速、遗漏、错讹等原因而出现“习非成是”的情况和“板上钉钉的误用”的情况。况且,结构主义的归纳方法早就受到转换生成语法学家们的驳斥:第一,结构主义的归纳法不可能完整地描写语言;第二,发现程序是单向的;第三,结构主义的归纳研究在本质上无非是列举观察到的语言事实,然后进行分类,研究的结果只是构建了一部分类语法(徐烈炯,1988)。当然,使用频率的统计和内省判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

用纯粹内省的方法或随机收集语料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还是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二者的结合可能会提高结论的普适性和科学性,“内省一查证”式或“内采外证”式(萧国政,2001:6、11)是非常可靠的语料收集和处理方法。我们对语料的处理基本上是“内省判断+真实语料查证”的模式。具体做法是:(1)手工随机收集大量语料,这些语料经过我们的选择,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作为立论的具体实例,并在初期作为提出形名结构分类和组配规律假设的基础。(2)依据《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和孟庆海编,2003)每条形容词词项后边的说明和举例来初步确定形容词构成形名结构的情况。(3)通过我们基于普通话语感的自省以及请教他人的语感来判断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的可能性,进一步修正组配可能判断并统计。(4)利用网络的海量语言信息,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对《形容词用法词典》中的形容词进行了一一检索,摘取了前20—50个该形容词和各种名词组配的实例。(5)利用较为成熟的语料库(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CCL平衡语料库和中国传媒大学“有声媒体语言文本语料库检索系统”),检索常用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的情况。五条途径收集、处理和验证语料,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语料和结论的明显错误。

另外,我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穷尽性的,因为我们对全部可能组合进行一一辨别是不现实的,至少在时间和精力上是不经济的。由于很多可能组合的表现具有“类”的特征,我们人类天生的类推思维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加快捷地、概括性地掌握规律。因此,我们的做法类似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的某些模式:对部分数据进行预处理—概括规律—运用推广(效果测评)。简而言之,在使用语料的问题上,我们利用精心挑选的代表性语料和我们的语言直觉,概括出各类形容词和名词组合的规律及其类型,然后再进行真实语料的大范围验证,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 研究思路

刘丹青(2003: 21—29)用三个发音接近的英语单词 test(测试)、text(语篇)、attest(验证)来概括当代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语言类型学三大范式的研究方法特点,其中的“测试”指的是依据母语者的内省来说明语言的结构规律,一般不考虑不直接相关的语言成分,内省是形式主义学派多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部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语篇”是指依据真实语料(语篇)中的实际用法来概括语言规律,经常采用统计量化的方式来确定倾向性规律,注重语法单位和语境的关系,这是功能学派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而“验证”则是当代语言类型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选取一些传统的参项,依据跨语言的证据来证明,多考察某种句法结构在不同的语言/方言中的分布和表现,验证人类语言变异的极限,藉此发现语言的共性。三大范式各有优势,本研究在思路致力于尽量吸收它们的优势。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

(一)以跨语言视野考察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的性质、功能及研究意义

形容词问题在当代语言类型学中颇受关注,我们在尽可能占有类型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跨语言的视野来探讨汉语的形容词问题,最后确定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在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利用跨语言的证据证明现代汉语形名粘合结构的性质,并解释形名粘合结构的组配规律和语义特点。

在当代语言类型学中,形容词的相关句法属性是一个主要关注的对象。首先,当代语言类型学在开创时期就非常关注形容词问题。在格林伯格(Greenberg, [1963] 1966)的那篇经典论文中,所列举的总共 45 条共性中,有共性 5、17、18、19、20、21、22、24、31、40(原文序号)等 10 条论及形容词,主要是语序方面的,占了 22%,这说明形容词和名词的语序在格林伯格的心目中还是占据很大分量的。格林伯格(Greenberg, [1963] 1966)把修饰形容词(qualifying adjectives)和相关联的名词的位置视为语序类型研究中除主语和宾语的“第三个分类的基础”。但它们有不同的语序表现。虽然后来的研究成果证明,形容词和名词的语序并非像那些同样可能充当名词核心的定语的指示词、冠词、数词、量化词(如 some、all)等的语序那样,和动词、宾语等的语序具有较大关联性,但形容词和名词语序在多项蕴涵式中还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其次,在大量的语言类型

学研究成果中,有关形容词的语言共性数量很多。我们于2009年12月9日检索了德国康斯坦茨大学(Konstanz University)共性档案库(The Universals Archive)^①,该档案库几乎囊括了所有当代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在这个档案库中找到与“形容词(adjective)”有关的共性总共有127条,涉及形容词的词类性质、类别、句法功能等方面,该共性库不但列出了共性,还对共性研究的发展(如反例)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再次,形容词的词类地位和跨语言识别等问题是语言类型的研究热点。近二十多年来,人类语言的词类问题引起了很多关注,如有关跨语言词类判定的亨格维尔德(Hengeveld)、瑞杰可夫(Rijkhoff)等的“阿姆斯特丹模型”(Amsterdam model)、克罗夫特(Croft)的“类型学的典型”、迪克森(Dixon)的“核心语义类型—主要句法功能—主要词类”配对模型等等,各种理论都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形容词词类的跨语言的复杂情况,各家观点的分歧大多就在形容词的判定上,形容词问题成了语言类型学争议的热点,有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个别学者在不同时间段还会对某种具体语言的形容词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形容词词类已成为检验类型学词类理论的试金石。

后面的研究将表明,现代汉语的形容词和名词构成名词性短语的时候,组合式和粘合式的区分与其他语言的有标记定语和无标记定语、前置定语和后置定语、并置定语和修饰定语、形容词定语和形容词谓语等区分手段具有部分功能上的一致性,粘合式和组合式的形式差异可以用来区分形容词和名词组配在形式、语义、句法和语用表达上的差异,如形容词的语义类别差异(如性质、状态等的区别)、形容词的外在形式差异(如音节、结构复杂度、成分构成等的区别)、名词的语义类别差异(如具体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词等的区别)、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义关系(如限制性、非限制性、内涵性等定语的区别)、形名结构的信息特点(如形容词所表属性的已知和未知的区别)、形名结构整体所处的句法环境(如整个形名结构充当定语、状语、宾语、谓语、主语等的区别)、形名结构的语用功能(如整个形名结构表示称谓、表示属性和表示归类等的区别)、形名结构组配的频率(如常见组配、偶见组配等)、形名粘合结构所处句子的功能类型(如陈述、祈使、感叹、疑问等的区别)等等。形容词和名词组配的粘合式和组合式是两种相对独立的功能性手段,采用粘合式或组合式是根据形式、语义和表达的需要进行选

① 该共性档案库由弗朗斯·布莱克(Frans Plank)及其合作者整理和建立,网址为 <http://typo.uni-konstanz.de/archive>。

择的结果,和前述其他语言中形容词的不同句法形式的功能区别有着同样的价值。还可以进一步抽象,“直接粘合”和“使用功能词组合”就是两种不同的句法手段,在其他结构如“名词+名词”、“动词+名词”、“状语+中心语”中也同样可以因为功能差异而分别选择。

(二) 注重真实语料和内省判断相结合,在小句语境下考察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的条件和类型

以往的大多数关于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条件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两个大的方面:(1) 形容词本身的类别,如单音节形容词更倾向于构成粘合式形名结构,状态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更倾向于构成组合式形名结构等。(2) 形容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一般认为只有当形容词所表示的属性是名词所表示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并习惯上作为分类特征的时候,形容词才会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这类研究一般只需要考虑两个成分(即形容词和名词)以及二者的关系就可以了,研究的用例也多用短语形式。《现代汉语词典》、《形容词用法词典》等有关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的举例,也以短语居多,一般不涉及形名短语之外的其他句法成分和语篇环境。这种倾向于静态的分析优势是很明显的,我们按照“若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在对形名粘合结构的组配规律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在形容词和名词两个成分之间即可解决,则尽量不涉及其他相关因素。

用形容词和名词两个成分来考察形名粘合结构的组配规律,我们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1) 形容词的次类对组配的影响。(2) 名词的次类对组配的影响。(3) 形容词和名词的音节数目对组配的影响。(4) 认知语义对组配的影响。对于第4方面,我们将做重点考察,认可部分学者从理想化认知模式、概念距离等角度处理形名粘合组配问题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引申和发挥。另外还特别强调与距离象似性(iconicity)原则相反的一类情况:认知处理的经济性也会把那些概念距离远的、语义复杂的“属性—主体”关系处理为形名粘合结构,概念距离与形名结构、概念复杂度与形名结构之间的标记颠倒现象大量存在。这一点也是本研究和其他研究不同的亮点之一。

静态的分析方法只考虑形容词和名词两个,其他不直接相关的成分一般都不予考虑,然后通过分析形容词、名词的形式和语义特点以及二者的语义关系来确定能否组配。这是一种拆零的研究方法,首先把形名组配从相关的语境中拆解下来,然后再把形名结构拆解成形容词和名词两个成分,接着对这两个构成成分以及它们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个结论被推广到它们原先被拆解下来的类似完整语境中。这种拆零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成熟的科

学研究方法，但早已受到部分学者的批评。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为普里戈金（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斯唐热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所写的前言“科学和变化”中说：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的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我们常说的 *ce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Prigogine & Stengers, 1987: 5）

但是在心理学界，注重“整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早已在 20 世纪前期就开始流行。如由科勒（Wolfgang Kohler）、考夫卡（Kurt Koffka）、勒温（Kurt Lewin）和其他一些 20 世纪 30 年代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心理学家创立并发展的“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认为人们对于环境和事件的认知并不是由许多独立成分组成，而是一个“动态的整体”。（Taylor, Peplau & Sears, 2004）

显然，“拆零”方法的优势很明显，可操作性很高，但其研究结论可能回避了很多应该考虑的事实。康德说：“不要轻率地减少实体的多样性”，对形容词和名词组配规律的考察如果只使用拆零法，只依靠内省的静态材料，必然会忽视形名粘合组配的复杂多样性，必然会忽视小句中相关的其他成分、结构的整体功能、相关语境等在构成形名粘合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往往无法“设其他情况都相同”，注重该形名结构整体在相关句子、语境中的实际表现是探求其构造规律和语义表达的必由之路。

静态分析方法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便于把握，且规律相对较为显明。但是仅仅这样分析形名粘合组配的规律是不够的。静态能够构成形名粘合式组配的形容词和名词，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中一般是能够组配的，但是部分静态不能构成形名粘合式组配的形容词和名词，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也是可以构成粘合式组配的。沈家煊（1999：290）就指出有的形名组合在静态组合中一般要使用组合式，但入句以后可以不加“的”，如“大方的举止”，单说时一般要加“的”，但在“她在酒会上的大方举止令人刮目相看”中就可以不加。赵元任（[1968] [1979] 2001：304）也认为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